

辛亥 革命 史稿

2

中国同盟会

金冲及 胡绳武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辛亥 革命 史稿

2

中国同盟会

金冲及 胡绳武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孫文

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政纲

號登第

孫文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將英特約記者爲憂慮而無所終歸填塞於不可見之河而自逸其其辭皆以言古人之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尤大爲懷公論通國者以爲夫封建之固與官制之固皆已不可見其最宜此舉之歷史既與教育無關係所以應施行之之說不無後見進止之別由之不武此所以爲實施之難也余繼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生曰民主爲民生主義而歐洲各國以獨立自治自當其最盛行專制而不堪其苦民權主義歐洲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自治立憲政體雖有異而階級人智益發物皆發達百年發於千載經濟問題隨政治問題而發則民生主義顯。總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播種時代也是三民主義者本於民道變遷年及今而後始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速焉其禍害於未明無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立憲現成後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group of seven peop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standing outdoors in a snowy or wooded area. A man in a dark robe stands in the center, flanked by women in patterned robes. A child is lying on the ground in the foregr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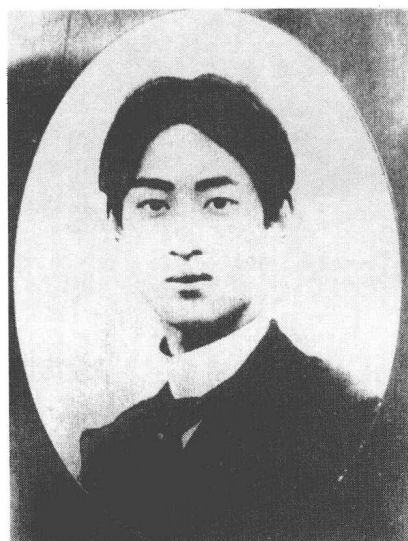
黄兴(卧者)与《民报》编辑部部分人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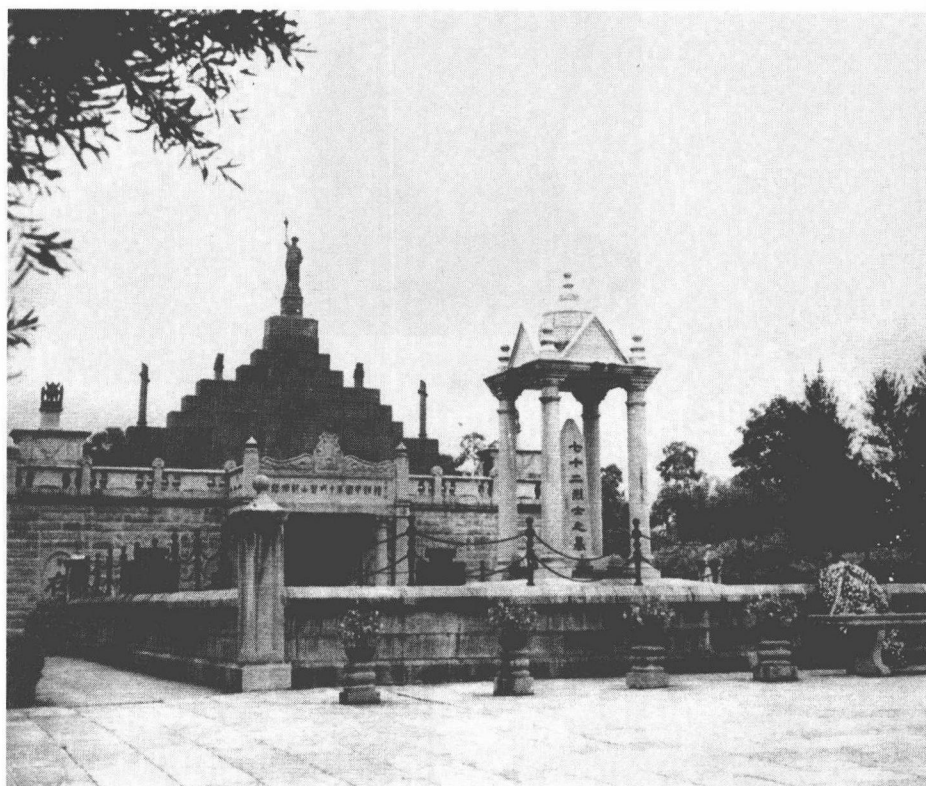
吴樾



秋瑾



熊成基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本卷目录

(一) 新阵势

一、1905 年后形势的变化	355
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370
三、武装起义的准备	376
四、从《二十世纪之支那》到《民报》	384
五、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402
六、吴稚晖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	410
七、《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	416
八、同盟会内地分会的纷纷建立	436
九、《复报》、《洞庭波》和《云南》的创办	452
十、《民报》创刊周年纪念	465

(二) 大搏斗

十一、一声春雷的萍浏醴起义	474
十二、孙中山领导的钦廉潮惠起义	494
十三、徐锡麟和安庆起义	508
十四、秋瑾	518
十五、同盟会的内部分歧和共进会的成立	529
十六、章太炎与后期《民报》	542
十七、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569
十八、《河南》、《四川》、《夏声》等刊物的出版	587
十九、收回路矿运动的逐步高涨	604
二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621

二十一、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	627
二十二、从镇南关起义到河口起义	643

(三) 大动荡

二十三、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变动	659
二十四、安庆新军起义	672
二十五、广州、上海革命活动的重新兴起	680
二十六、同盟会本部的涣散和光复会的重建	701
二十七、各省谘议局的成立	708
二十八、社会经济的大混乱	719
二十九、席卷全国的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	726
三十、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740
三十一、广州新军起义	764
三十二、可歌可泣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773

(一)

新 阵 势

一、1905 年后形势的变化

1905 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把这以前和这以后比较一下,很容易看到:无论客观形势,还是革命主观力量的状况,都有很显然的不同。

客观形势在这前后最重要的变化是:帝国主义列强这时转向以偏重经济性的、比较温和的形式来压迫中国。他们叫嚷“瓜分中国”的调子比前一时期相对地要缓和一些。而清朝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这时激起了人民大众更强烈的愤恨。于是,就显出了中国国内矛盾的特别尖锐性。

这个变化,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很快感觉到了,甚至是夸大地加以理解了。

1906 年 7 月,《民报》第 6 号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中写道:“尔来瓜分之说,已如烟消云散,不复有称道之者矣。”^①同一个月出版的《新民丛报》第 82 号上,梁启超的反驳文章中也写道:“夫瓜分之说,极盛于乙未至庚子六年之间,而庚子以后,日以失势,去年以来,更阒寂焉,其变化所以如是其速者,实由亚东形势之自身有变化使之然也。”^②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针锋相对、截然对立的,但对客观形势的估计却作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这绝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

①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 6 号,页 23。

②饮冰:《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 82 号,页 31。

梁启超说：“实由亚东形势之自身有变化使之然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日俄战争产生的影响。19世纪的最后几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经过激烈的角逐，大体上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最野心勃勃的要算是沙皇俄国。它并不满足当时一系列协议和条约中已得的利益，还想独吞东北和蒙古，并将它的政治、经济势力向中国的腹地华北以至长江流域推进。这就使它同原来在华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以及新起的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它们之间的激烈争夺，构成了20世纪最初几年远东局势动荡不定的重要根源。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正是这场激烈争夺的必然产物。战争的结果，沙俄遭到惨败。1905年9月，日俄和约在美国的朴次茅斯签字。沙俄被迫把它在南满享有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暂时处于退后一步的地位。而日本那时还是一个新起的强国，一下攫取了在南满的广泛特权后，需要有一段消化的时间，一时也无力他顾。这就使列强在远东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一个相对的均势，使他们在中国的角逐暂时有所缓和。

但这样说还不完全。问题不仅是“亚东形势之自身有变化使之然也”，而且是整个国际局势“有变化使之然也”。

在这个时期内，整个国际局势又有什么变化？最突出的是：英、德争霸世界的斗争急速地激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德国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它都以咄咄逼人之势对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国风报》上有人正确地写道：

“迨来英、德两国日相轧轹，匪特政治上有然，即生计上亦莫不然。推原厥由，实因德国数十年内国势骤盛，产业勃兴，着着凌驾英国。昔日英货销场渐为德人所蚕食。比年德又扩张海军，其意不尽夺英国之海上权不止。故英人惊危忧患，自十九世纪初期战拿破仑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英国国是，缘是动摇，一若生死存亡之机，悉悬于德国海军告成之后者。是以君臣上下，狼狈扰攘，靡有宁日。”

(一) 新阵势

“抑英、德交恶，积之既久，将成事实。此又将来世界一变局之机，我国人如之何勿思？”^①

随着英德矛盾的急速激化，于是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一方同以德、奥、意等同盟国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在日俄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帝国主义列强的注意力已开始被欧洲和地中海区域发生的一些事件吸引住了。1905年春季和夏季发生的摩洛哥危机，是英、法同德国之间矛盾迅速尖锐化的突出表现。这年10月，英国从远东召回自己的全部主力舰，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海军力量。欧洲风云渐趋紧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日益临近。弥漫在欧洲大陆上空的空气中已能闻到浓重的火药味了！

对这种趋势，1908年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上已有评论：“英、法近日交情益密，对德外交咸执同一之态度，两国民亦热心于协约扩张之计划。英法同盟之说，不日将见诸事实。”^②到1910年，梁启超也写道：

“夫并世诸国中能为英患者，莫如德；其蓄志谋英者，亦莫如德。英德不两大，此稍明时局者所能知也。而法者，又德之仇讎也；俄者，又德之仇讎之友也。俄之败于日也，德人见其仇之友不复可恃，而亟思所以蹶之。挟德、奥、意三国同盟之力以蹶一法，法之不支，明也。法不支而德遂霸欧洲中原。德霸欧洲中原，英其殆矣。故英既已亲法，更进而亲俄，于是英俄协商起。英、俄、法三国协商，隐然与德、奥、意三国同盟对抗。而在此则主之者为英，在彼则主之者为德。此现在欧洲国际政局之分野，犁然可见者也。”^③

①明水：《英德交恶论》，《国风报》第1年第1期，著译，页1、9。

②鲁曼：《英法对德同盟之政策》，《夏声》第7号，页51。

③沧江：《中国外交方针私议》，《国风报》第1年第24期，页16、17。

这种局势的演变,使帝国主义各国在考虑自己的全盘行动计划时,不能不把它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

为着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英、法等国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的主动行动,积极调整彼此间的关系。1907年签订了英俄协定,调整了两国在伊朗、阿富汗和我国西藏的严重矛盾,以保证俄国能加入英法协约。同年6月签订的法日协定和7月签订的俄日协定,又把协约国的行动范围扩大到远东,并促进了法、俄与日本的接近。1908年11月,日美两国之间也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这一系列协定的签订,成为当时远东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现象。

确实,从协约国外交当局看来,当时在远东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先维持现有的力量对比,不要去打破那种刚建立起来的暂时均势,以免顾此失彼,把他们迫切需要集中起来对付德国的力量再分散开去。这种战略性的考虑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微妙变动,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远东,影响到中国。

那么,他们是不是就此放弃或大大减轻对中国的掠夺和榨取呢?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这些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他们对华侵略的机会均等。1907年的日法协定,在秘密换文中双方确认法国在两广、云南的特殊权益和日本在东北、福建的特殊权益。同年的日俄协定划定了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也是如此。它们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一点,革命派也好,改良派也好,都程度不同地看到了。

革命派的《河南》杂志写道:

“今则吾国内不问何省,省不问何地,一草一木,一沙一礁,非皆已于他国之最近协商时而默于意中互相认许耶?”“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

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于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①

改良派的《国风报》也写道：

“列强之相压，非一日也。然畴昔皆人自为战，若其最近协以谋我，咄咄可畏者，尤莫如英、法、日、俄之四国，盖以协商结果而使弱国位置一变之征也。”“语其内容，则不外互相尊重其在中国所已得之权利，毋或相侵，而未得之权利，则持机会均等主义，毋或垄断。质而言之，则此四国权力所已及之地，期于无复挠其权者；而权力所未及之地，则共逐失鹿，凭高材捷足之先得也。天下可畏之局，盖未有甚于此者矣。”^②

应该说：这些认识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一系列协定的签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动向，那就是各国联合起来向中国投资，特别是向中国的铁路投资。1905年，英法资本联合组成了华中铁路公司，企图取得湖北到四川之间的铁路的兴筑权。1909年，德国银行团也参加进去，三国银行团协议共同向清政府贷款，修筑湖广铁路。1910年，美国资本家也参加了，组成规模更大的四国银行团。1911年4月，他们同清政府签订了一个“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的贷款合同，准备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并挤入原来由日、俄两国控制的中国东北；5月间，又由四国银行团和清政府正式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前一项贷款并没有实现；而后一项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终于成为引起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①朱宣：《发刊之旨趣》，《河南》第1号，页2。

②沧江：《中国外交方针私议》，《国风报》第1年第24期，页13、14。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这时转向以偏重经济性的、比较温和的形式来压迫中国,直接瓜分的危机一时稍有缓和,于是,人们对那个卖国的腐朽的清朝政府的愤恨就越来越显得突出了。

1905年前,这个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的面目早已暴露出来。这时,人们的认识就更加痛切了,把它看作是中国所以处于危亡境地的“祸首乱源”。他们写道:

“大陆沉沉,风云惨澹,四万万方里版图,四百兆智愚人民,俱处于黄发紫须儿支配之下,欲割则割,欲烹则烹,黄帝神明之胄久不齿于世界人类矣。而其所以致此颠覆流连一发千钧者,伊谁之咎?考厥祸首乱源,不得不痛恨太息犹生存于廿世纪之野蛮政府也。”

“夫政府者何物也?非一般同胞组织一高等机关,捍围土地财产生命计乎?迺政府自庚子甲午之后,蔑外之手段变为媚外之手段,将十八行省之路权、矿权、邮政权、森林、航海诸权,直接间接,掬而送之列强之手。”“试一披支那颜色图,莽莽大陆,容有一片干净土也?是各国政府为捍围扩张土地财产之政府,而中国政府为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也。”

“吾敢肯定之曰:中国政府非同胞之政府,迺列强假设之政府也,如越南法之总督、满洲日之总裁;不过支那地大物博,非设一总机关,不足宰割行省,此北京政府所由设也。中国政府夙以吾同胞制吾同胞者,今列强犹以中国政府制吾同胞也。是有中国政府,吾同胞即无余命,矧犹有列强之总政府以盾其后也。欲不死,焉可得哉?际是时也,即合群策群力,推倒今之政府,犹惧国运已亡,莫救丧乱于末路。使复侃侃侃侃,忍奴隶牛马之辱,不唯亡国灭种之祸莫挽,纵死于九泉,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①

| ① 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河南》第5期,页34、35。

（一）新阵势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又急速恶化，清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榨取几乎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国内社会矛盾也大大激化了。

由于对外支付巨额赔款，加上对内维持反动统治所需的日益增加的军费，使清朝政府本已十分紊乱的财政状况更处于崩溃的边缘，使它向人民群众征收的本已十分苛重的捐税变得更为苛重、更使人无法忍受。甲午战前的1894年，清朝政府的岁入为八千一百多万两，岁出为八千零二十多万两；一八九九年，岁入为八千八百多万两，岁出达一万零一百多万两；一九〇九年，岁入已猛增到二万六千三百多万两，岁出达二万六千九百多万两；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清朝政府度支部所列预算中的岁入为二万九千六百多万两，岁出达到三万八千一百多万两。所谓岁入的逐年猛增，自然不是什么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来自竭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拿1899年和1911年比较一下，十二年间，清朝政府向人民的搜刮所得竟猛增到三倍以上。本来，在生产发展迟滞的封建社会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只能是十分缓慢的。甚至在甲午战前的五十多年里，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可是，在这短短十多年里，财政搜括却陡增三倍以上，这自然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尽管如此，清朝财政的严重入不敷出现象依然有增无已，必须进行更残酷的榨取，才能应付这种局面。于是，各种苛捐杂税，巧立名目，更加层出不穷。1909年，御史胡思敬奏称：

“漕粮、地丁、耗羨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①

① 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疏》，《退庐疏稿》卷一。

再以四川当时的记载为例：

“四川腹削过各行省。除盐、油、糖、烟、丝、麻、布帛、煤、铁、彩票、土行大宗敛钱外，茶桌捐、床铺捐、一鸡一猫入城莫不有捐。如米店带油盐纸烛，先捐米底金五十两方准卖米，又捐五十两方准卖油，加卖一货必加一种底捐。提篮卖鲜花月捐千钱，叫街卖熟豆岁捐十金，污秽至屎尿，微贱至土优土娼皆有常捐。苦工宿店每夜八钱亦加四钱，他可知也。”^①

其结果，自然就使本已穷困不堪的下层人民更处于无法生存下去的境地，也使广大群众中本来日益增长的愤怒终于达到了大爆发的地步。

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愤怒，阻止革命的爆发，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假立宪的措施，一时也搞得煞是热闹。但是，空言无补于事实。骗局一旦被揭破，使人民的愤怒更加不可遏制，反而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同盟会的叛徒孙毓筠在供词中说：“此次立宪改制尽属一篇空文，海内人心均大失望，即向持中和主义之人，亦大半倾向于革命一边。”^②确实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种真实状况。

而控制清朝统治大权达四十五年的西太后以及光绪皇帝在几乎同一时间内相继死去，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地主阶级的分裂，以及最后主持清朝朝政的载沣、奕劻的昏庸腐朽，凡此等等，更增加了反动统治阵营的混乱，促进了革命的爆发。

卖国腐朽的清朝政府已成为万众唾骂的对象。人们越来越把千仇万恨集中到这个帝国主义走狗的身上。旧的统治秩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秦枏：《蜀辛》，页2。转引自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页27。

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页711。

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有了重大的增长,掀起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发展高潮,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种民族危机深重、社会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却会有重要的发展?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中国内地,特别是,随着外国工厂在中国纷纷成立,各地商埠陆续开辟(1906年至1910年这五年间新开辟的商埠达三十二处之多),铁路、轮船、电报等新式交通和联络工具有了新的发展,外国货物在中国内地得到大量倾销。这一切,就使中国内地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使国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速扩大,从而使投资近代企业有优厚的利润可得。优厚的利润,比任何因素更有力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投资。以铁路为例:京汉铁路1905年所获净利达三百万元。粤汉铁路同年通车一段计九十里,每年收车费洋四万五千元,支出仅一万五千元,其余都是净利。于是,就出现了士绅富商争相投资路矿的盛况。正如《中外日报》所说:“苟非确知此中利益,则彼与股者又确系大埠经商阅历有得之人,亦安肯掷黄金于虚牝哉?”^①

第二,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以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为起点,全国各地收回利权、抵制外货的运动大规模地展开。许多人认为,要是中国人自己不迅速奋起向工矿铁路事业投资,这些利权就都将为帝国主义列强搜夺而去。这种紧迫感,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著名的由简玉阶兄弟投资创办的南洋烟草公司和北洋烟草公司,就是在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中开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905年至1911年,新设厂矿达二百八十八家,资本为七千四百八十七万四千元,七年间的投资总额与以往三十多年投资的总和相等。^②

①《论路股之获利》,《中外日报》1906年4月9日。

②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页96。